

# 導論：中國的邊緣與邊界

## 從香港出發

彭麗君

對我來說，「中港關係」不是一個學術用詞或研究題目，而是一個伴隨自己長大、從沒有消失過的日常生活狀況。自有記憶，家裏每天早上都有新鮮供應的《萬人日報》和《香港時報》，報章上刊登的中國大陸政治鬥爭和民間疾苦，爸爸會用心地看和高聲地罵。隨著這些親台報章在香港一份一份地結業，我也再看不到父親在「雙十節」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掛出露台之外。小時候的記憶迷漫，今天只隱約看到諾大的紅藍旗幟飄揚在高聳的公屋外牆上，和色彩斑斕的曬晾衣物一起爭妍，不知是崇高還是滑稽。因為父親曾經上過大學，又當過海員，他有其西化的一面，有空會教我和哥哥跳茶舞和用刀叉；但可能是長子的關係，他又特別保守，他會盡他所能在香港這個南緣城市保持和守護著他記憶的家鄉生活，例如曬臘鴨和聽京劇。因為它們永遠跟香港的濕度和味道格格不入，所以我總覺得自己不完全屬於這個城市。也正因此，自小我就擁有一雙對西皮與

二黃比較敏感的耳朵，可就是沒有相關的味蕾，只有港產片《打擂台》的幾幕影像隱約觸到我的神經線。

不論各人的家裏有個怎樣的爸爸，「九七」都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中的最大恐懼來源，香港很快忘記了曾經激情過的反共文化，因為香港再沒有這個特權。「反共」在七十年代前能夠在香港成為社會主旋律，除了因為南來移民佔人口的大部分，也因為冷戰和殖民者的栽培，跟今天的「愛國」異曲同工。在我的成長記憶中，香港的所有自身想像都有中國或明或暗的存在，這可能是大部分內地同胞都不容易理解的。香港其實一向處於邊緣，也一直自危，就算沒有CEPA，中國也從來支配這個城市的一切：無論是豬、牛、羊、日用品和罐頭，還是更重要的食水和空氣。也可能正因如此，這個城市才如此執著自己的身份，而羅湖那條貌不驚人的短橋，到了今天還是如此實在和厚重。

今天香港回歸了十五個年頭，成年的大學生們基本上已完全沒有殖民地回憶，但今天中小學的「國民教育」卻還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很多香港人依然搞不清自由行大款、迪士尼插隊小朋友、來港產子孕婦和「六千元」受惠者的分別——「中港關係」的書寫依然困難。反而，因為香港政治的死胡同式進展，近幾年香港年輕人開啟了對社群保育的新討論，把「香港人」這個概念從政治發展推回更實在的日常生活和集體回憶上，讓我們反省香港究竟只是一個抽象和華麗的「全球都市」，還是一個我們每天經歷和經營的生活內容。但在某程度上，這種討論卻又迴避了一直曖昧和緊張的「中港關係」，更因為「抗中心態」的發展和壓抑，孕育了民粹主義的種子。如果我們不正面處理跟內地的關係，香港故事只會更說不清楚，香港人也只會更視野狹隘、仇視多元——這是我的最大恐懼。

可能是受到父親無形的影響，打從博士論文起題開始，我的研究興趣主要都放在中國上。雖然我理解的中國和他的沒有太多重疊，但可能是因為他對家鄉的某種固執，讓我這個么女繼承了他的一份國家關懷，也一直在意自己作為香港人的位置。有一些批評聲音，說今天國際學術的焦點都放在中國上，文章要榮登國際期刊，中國題目有把握，所以很多香港學者都捨棄自己的城市本位，隨大波、逐激流去擁抱中國，用英文寫中國，繼續發揮香港人的買辦角色。另一方面，在內地的學者對香港人的中國研究也常有微言，總覺得我們的東西是投其所好，寫給洋人看。這些批評，我總恭敬受教，但我也知道，除了自己之外，很多香港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嘗試去理解今天的內地或昨天的中國，絕對不是只有眼前利益的計算，其實也反映了大家不同的承擔和價值觀：離開香港，不等於是叛徒，反而，細心觀察內地也同時是理解香港的一個方法。

在以下的文章中，各香港學人會為我們介紹他/她們對「中國邊緣」的研究心得，我希望本書能為我們展現一種不一樣的「中港關係」。中國要面對香港的回歸，當日重用了「一國兩制」的二元架構，我們從此被賦予了一個充滿可能性的論述空間：香港特區可以是國家中心的一分子，也可以是內地的例外。因此，香港可以和上海爭取成為國家的金融中心，做珠三角的龍頭，而香港的明星可以繼續爭取為國際品牌作大中華市場的代言人；另一方面，香港又可以代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法律和社會制度，我們可以繼續高舉我們的獨特歷史，不斷重申我們所謂的「核心價值」。「一國兩制」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們不需要、也不能二選一，兩者必須同時「辯證」地存在，它們之間的矛盾和對抗，反而可以發展無窮的討論和生存空

間，所以我們必須繼續探討和珍視當中複雜的關係。

也正因為中港關係的辯證性，我希望通過「邊緣」這個概念，把「融入」和「分離」的討論再伸延。自從九十年代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展開，「跨界」這個概念就成為學術的寵兒。到了近年，「跨界」更被購物主義收編，成為潮流，成為「酷」的化身，只要有「界」的存在，理所當然地我們就要「跨」過它，這才叫「有性格」。可是，「界」的意義和重量就完全被磨掉，掏空了邊界的物質性，我們只有不斷地流動和漂浮，也再沒有可能討論在地和社群。

因此，本書正視中港之間的分界，也強調中國的國家狀況，但我們不會、也不能，把特區和內地直接放在邊緣和中心的對立上，而是通過各香港學者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邊緣的關心和內省，間接聯繫香港和內地的各種邊緣狀態。因此，本書有兩個任務：第一個直接的主要任務，是探討中國的邊緣問題，希望能夠通過批判思考，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的深和廣，了解國家邊界的時間及空間性，也探討某些邊緣生瀋的狀態；第二個間接的任務，是重塑香港的邊緣性，從而讓我們反思回歸後香港那些無止境的追逐，誓要在各方面成為國家中心的狹隘。回歸之後，全球化發展日洶，香港有太多危機感，不停發動競爭，要守住有利位置，不能落後於人，「邊緣化」成為香港最大的威脅。如果「邊緣」是恐懼的最大來源，我們更須正視它，努力和它共處。

其實香港人對中國邊緣的關心，除了是應有之義外，現在中國面對的很多問題，香港的利益也曾經參與，我們也有份製造和從中得益。如果我們可以把自已重新定位為中國的邊緣，而不是中心，可能有助正視這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港人的心理狀況也可能會健

康一點。再者，了解香港相對於中國的某種邊界屬性，我們或許會更懂得尊重這個城市自己的邊緣社群。況且，今天內地的國家主義當道，我們看到主權概念被無限擴大，香港的任何討論都不能越過這串無止境的雙黃線。在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當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想像及應對國家走入世界的中央時，也是我們展開中國的邊緣論述的時候。邊界才是一個國家主體的最具體呈現，如果我們看不到邊緣，我們也不會看到世界。

那麼，我們可以如何理解邊界這個概念？

邊界代表兩個地域相接壤的分界，對外有拒絕、摒棄的意思，對內代表包圍和保護，區分「我們」和「他們」。因此，邊界對身份的建立有重要的意義；邊界也是秩序和紀律的必要元素，邊界以內的整齊相對邊界以外的混亂，邊界也可以防止外面的雜質滲入，影響我們的純度。可是，邊界永遠是人工的結果，因此它的釐定也從不容易；邊界隨時瓦解，又可以隨時建立。國家的邊界成為邦國之間的永恆問題，甚至成為戰爭的藉口。至於眾多抽象的身份和利益區分，當中的邊界更是充滿隨意性和論爭性，很多是弱肉強食的歷史結果，當中各利益團體也運用了各種論述和再現，嘗試鎖定對自己有利的邊界，期望把人工組構的邊界自然化，迴避責任和質問。因此，邊界有其複雜的歷史向度，邊界不單是一個空間地理的問題，更是一個時間歷史的問題。同時，所有國家都必須不斷面對自己的邊界，但往往在嘗試解決邊緣問題時，國家的整體性才呈現最大的自相矛盾，甚至面對瓦解的可能。

邊界有它的物質性，邊界以外更是無限風光。我一向對「它者」這個概念有濃烈的興趣，而「它者」就可以理解為邊界以外的人或

物。「它者」(alterity)並非「不同」(difference)，我們不能用「求同存異」的方法處理，「它者」是一種跟「我」或「我們」完全不一樣的存在，沒法互相理解，而「我」也沒有辦法把它放在自己的認識系統中。正因為這種異己性，「它者」的進入可以對現狀帶來很大的衝擊，逼使我們面對既有秩序背後的種種假設，也讓主體有機會面對界定自己身份的邊界，帶來重新劃界和反省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它者」是個人和群體必不可少的部分，沒有社群是完全純粹的，也沒有一個主體是完全自主的，就算在邊界之內，總也有「它者」的蹤影，我們不能把它納進自己的運作，但它是建立主體的積極構成。如果我們可以正面面對邊界以外和以內的陌生人，我們會更了解自己。

本書的第一部分就是希望能探討中國邊界的各種構成論述，從歷史看地理，也從地理看歷史，了解「它者」是如何被拒於外之餘，「它者」又如何被利用來建立純粹的「自我」。因為身份建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本書的第一部分特別關注各邊緣論述的歷史性。羅貴祥通過對歷史的細心整理，提出中國與其少數民族的互相建構，兩者不是簡單的主次關係，又或者，中國必須依賴對少數民族的不斷論述，才能自圓其說本身的所謂整體性。孔誥烽和郭慧英所持相似的理念，探討從清朝到中共，中央政府如何不斷嘗試與邊陲地區更新關係，以達共存的可能。但孔和郭的重點不在知識論，而是實際的政治操作，文章通過分析西藏和台灣的經歷，重看香港跟中央的關係。余少華一文的重點是文化，他把我們的歷史視野拉得更遠更廣，通過重讀中國音樂史，理解少數民族音樂是如何被中國正統論述收編。這段歷史充滿歧視，但外族音樂的異國風情，又不斷引誘著中原。黃芷敏的文章探討在帝國覆亡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想

像中國的統一，以及如何把中國發展成一個現代國家，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文字與國族的關係。當時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法，就是中國文字的拉丁化，在解決文盲的同時，這建議也重新整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回應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威脅。

我希望這四篇文章能為我們帶出民族和邊緣不能分割的關係。從這幾個歷史的分析和個案中，我們看到，若要深入探討中國民族性的話，我們不能不面對少數民族的存在，頭三篇文章都有提到清朝對中國民族論述的重要性的曖昧性：因應著滿族相對漢族的原有邊緣屬性，以及清朝的帝國概念，清朝的民族政治對今天中國面對的很多問題都有很大的啟發性，可是，跟隨著帝國的覆亡，當中提出過的很多豐富問題就沒有再發展，中心與邊緣如何溝通，難題越來越懸空。另外，黃芷敏的文章也提醒我們，中國的文化和語言統一不是理所當然、已在永在的事實，反而我們的前人曾經提倡中國文字永遠消失，因為只有通過消滅漢語，漢族才真正可以跟其他民族平等地溝通，文化階級的分野才能磨平。在今天看來，這可能是胡言亂語，也可以是一個另類的提醒。

第一部分的幾篇文章都提醒我們，中心往往通過製造邊緣和等級來維持自己的權力。本書第二部分的作者就把這種對權力的敏感度聚焦在今天的中國，主力分析各種邊緣生活，探討所謂的邊緣狀況如何成為很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也分析邊緣和中心的辯證關係。潘毅和許怡深入解析富士康工人的生活狀況，探討中國一種普遍的經濟模式——由跨國資金（尤其是港台資金）帶動，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合，壓制著中國工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以在全球激烈的競賽中繼續牟取巨利。最痛心的是，這種經濟模式在中國還發展了一

種新的管理體制，不但從經濟方面剝削工人的薪水，更製造一種邊緣和孤獨的生活狀況，令很多工人在絕望中只能以自殺作為逃離的唯一手段，被逼為「大國雄起」付出自己的生命以為其代價。陳順馨文章的民族志性質更強，個人反思性也非常明顯，表達她自己與一些農村婦女共同成長經驗。農村曾經是新中國的搖籃和出路，但到了今天，農民成為了國家發展最大的受害者，但相對前文的悲觀，陳順馨選擇了一個較正面的角度看中國的農村未來，她的文章也帶出一個盼望：改革中國的動力和想像可能只可以來於邊緣的生活狀態。龔立人的研究把中央政府和個別宗教的政治關係理解成一種互換關係，當中不是簡單的誰從屬誰，更重要的是各種權力的平衡和交易，中國政府今天所提出的「和諧社會」理念，背後充滿各種利益的計算，各個「出世」的宗教，似乎都不能倖免，要去玩「入世」的遊戲。我自己的文章，把盜版和創意放在同一平台上研究，希望帶出抄襲和創新的偽相對狀態，也重新論述中心與邊緣的連續關係。

通過以上幾篇文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多元的角度來看待邊界。不錯，邊界的生活很多時候是一種被邊緣化的生活，潘毅和許怡的研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但從陳順馨的文章中我們又可以看到，邊界也可能發展一些獨特的狀況和生態。我想特別指出，邊界不一定是一條只有長度沒有寬度的線，也可以是有面積、能居住的地方。香港位處邊界，但香港也有邊界；中國的香港可以居住，香港的沙頭角可也以居住，位處邊緣可能是逼不得已的結果，但這種生活也提供居住者一種比較開放流動的生活方式，因為生活在邊界上的社群沒有穩定的邊界概念，他/她們的日常生活蜿蜒於不同的社群中，可能也要不停地做溝通翻譯的工作，因之而建立



的社群也被逼不停自省。同時，相對中心的秩序和規範，邊緣往往可以孕育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反抗既得利益。如果我們相信香港和中國的很多邊緣地區一樣，界於不同的生活狀態和價值之間，我們也可以用一個比較正面的角度看待這種生活方式，相對於所謂的中心，邊緣生活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這又讓我回到這本書的主題：「邊緣」和「邊界」基本互通，但「邊界」直接指向特定的空間和位置，本質性和物質性較強，而「邊緣」可以比較抽象，泛指相對中心的社群和狀態。因為空間和權力永遠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邊界的生活容易被邊緣化，但是又因著其他的權力因素影響，邊界可以成為中心。香港人和中國的很多少數民族都生活在國家的邊界，但香港的境遇特殊，不但沒有被邊緣化，反而成為進步的指標，又或者，中國的沿海地區才是這個國家的中心。我們無法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國家邊緣，但我們可以通過對邊緣生活的關心和閱讀，發展一種比較理智的模式，反思自己跟權力的關係。

因此，本書的第三部分回到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探討香港相對中國的各種邊緣和中心的討論。周耀輝討論的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邊緣化問題，這是香港很多人的共同問題，面對內地的經濟發展，香港人以往引以為榮的流行文化快速萎縮，面對這不爭的事實，我們應該如何自處？他帶出流行和流動的關係，也對香港流行音樂的邊緣化狀況提出樂觀的想像。周的文章也可以跟余少華的文章遙遙呼應，如果余少華在中國歷史中看到邊緣音樂的曖昧性，一方面它的異國情調直接增加其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中原音樂又必須把它收編，那麼，香港今天的流行音樂相對中國的處境，是否也有可比較的地方？馬傑偉通過重塑近年中港的跨境文化政治，探討今天可以

如何再續香港的身份論述。他特別提及文化的想像層面，提出後九七的「香港重現」，很大部分是植根於香港人對內地不斷改變的想像，所以他所提出的「跨境文化」很弔詭，這是一個不斷游移於認同和拒絕的不穩定狀態。李祖喬把中國的邊緣討論放在香港的左派身上，回顧今天香港的所謂建制力量，如何在殖民時期處在一種邊緣狀態，而這種邊緣所相對的不單是香港殖民政府，也是中共的中央政府。李祖喬的文章也回應了孔誥烽和郭慧英的提醒：一國兩制的概念有其歷史因緣，但我們還是有很大的空間去繼續實驗和實踐。

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支持下，我們在2011年6月舉辦了一個小型研討會，就有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主任林穎博士的鼓勵下，我在這個命題下向一班從事相關研究的香港學人約稿，多謝諸位朋友的認可，在百忙中抽空，分享了研究心得和個人看法，也豐富了「中國邊緣」的論述。雖然各文章的主題和方法不盡相同，整本書沒有一個統一的內容探討，但這種多元角度可以展示出香港對中國研究的活潑和多情，我特別感謝各位作者願意或多或少把香港的位置在其中國邊緣討論中凸顯出來，在探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各種邊緣模式之餘，也令本書多了一份難得的自覺。總的來說，本書希望通過各香港學者對內地的仔細文化閱讀，以及對自身的文化和學術位置的反省，讓我們共同思考中港關係的另類可能。所以這本書有一個比較強的政治和文化面向，表現我們對內地的關心，以及對香港的承諾，也正因為我們不會放棄香港的本位，我們更需要思考中國的邊緣和邊界，展現主流媒體所忽視的中國時空，也讓我們重新面對香港的邊緣位置。